

办事，不让老百姓说话，人们也不敢怎样他们。现在的村干部都是共产党，不一样了”。²⁶

为了增加群众信任，“不开密会”—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务公开——成为一个新政策：公开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支部和党员名单，接受群众监督；让群众看到、听到、参与到各种事项的讨论中；人事问题让群众说了算，由农民选举代表组成的农会来决定；“哪个干部要不要，不决定于公家人，而决定于群众”。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的“告农民书”这写道：

“不管任何一级，从村一级到边区一级的干部，共产党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，有监督、审查、批评、处罚、表扬、教育的权利。该批评的，该斗争的，该处分的，该撤职的，大家都可以批评，可以斗争，可以处分，可以撤职。如果是共产党员，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，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，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部批准。……就是真正由战斗部队退伍下来的，如果他横行霸道，为非作恶，也可以由大家教育处罚，取消他的优待资格。……”²⁷

临时农会号召农民对几项事情“负起责任”——对农会和政府组织的改造责任：改造各级党政军机关，审查和整理民兵、八路军队伍；对共产党的推荐责任：推荐好农民入党，“把共产党搞成更好地为农民办事的党”；对政府机关的选举责任：选举大家“愿意选的人到各级党政机关为大家办事”；……“凡是那些不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，农会就可以完全代替政权”。²⁸

对那些将信将疑，不相信自己真有这么权利的群众，临时农会鼓励大家：

“过去很多人有顾虑，……怕干部报复，怕纠正。现在不用顾虑了，因为咱

²⁶ 九地委，肃宁尹庄从思想上整组的经过及经验，，《群众路线研究》，页 21—22。

²⁷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，《土地问题指南》，西北局宣传部编印，1947，页 63。

²⁸ 同上，页 62-63。

们……有权管理和撤换干部，不怕了！过去有些‘纠正’的确是错误的，如今共产党已经检讨了这个错误。”²⁹

“为自己办事”的组织——农会成立的具体步骤是：在农民中培育积极分子；由积极分子找人建立农会的筹备组织；新组织的第一次会议，讨论要不要建立农会，谁可以加入农会，要不要介绍人，要不要大家通过，如何发展农会会员，如何推举农会会长。筹备会议的负责人由大家推选。而后以贫雇农为核心成立农会，逐步扩大会员，通过农会行事章程。到时机成熟有把握时，召开干部、农会、农民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。农会的职责是决定大家关心的事情，比如分田的方案。具体分配方案经过群众充分酝酿——先分几个组分别提出方案，然后交换小组讨论，反复讨论数次，直到大家都满意为止。方案待各组群众都通过以后再分田，分后由群众推代表，建立“果实分配评议委员会”。对干部分得的果实要公开列单，叫群众讨论，看他们是否同意按照成分和政治条件分。总之，“农会、贫农小组，工作组三者结合，即成为土改中群众路线的具体形态。各级党组织应把大权授给他们，去进行土改……”。³⁰

战场之外的政治竞争

群众路线作为政治战略的重要性，并非是各级干部都有的认识。在解放区基层不少党员干部头脑中，这样的想法普遍：江山靠的是流血流汗和生命换来，靠打胜仗赢得，群众因此受到我们的益处，又为何需要争夺群众？部分从作战部队下来的干部，自视在前方有功，傲慢无礼，指挥指使。

“一些干部站在群众头上，轻视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为“第四等”干部，称群众工作干部为“民运二哥”，区工作干部被当作通讯员差遣；随便调走群众干部，不给群众工作独立性和民主性，由党包办，政权干涉，随便调动群众干部，命令

²⁹ 同上，页 64。

³⁰ 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，《群运手册》，页 8-9。

他们催给养催公平负担”。³¹

与基层状况不同，中央工作组则充满“失去群众”的危机感。这种危机感可以发现在所有文件的字里行间。他们告诫，只拿到政权，不是真的胜利，满足于掌握政权，是没有基础的、形式的、非持久的、非真实的假胜利：

“有人说，用军队和政权的优势，在合法权力的慑服下，不用经过斗争也可以胜利，但这种胜利是假的，形式的，非真实持久的。”……

因为，“这种脱离群众的胜利，自然会让他们（群众）想到（好处）是人家给他们的，……但被动地看不见自己的力量，也不相信自己，只依赖八路军与政府。有的青山在则一切都好，如果遇到困难，假如军队或政府受到打击缩小或塌台时，群众如何依赖军政？这时就会发生动摇。所以这胜利是假的，我们失去了真正的组织与依靠群众的胜利，这是非常危险的”。³²

失去群众主动真心的拥护，就会使胜利无法持久稳固，就会在政权面临危机时失去根据地，这一政治危机感是当时“群众路线”取得战略地位的关键。这种危机感来自战争“拉锯”时期乡村工作的经验：赢得人心，消除陌生感，认同党的领导和执政——这些并非是前线打胜仗的自动结果，也不是财富再分配的自动结果，赢得政治支持还须通过寻求农民的利益、释放他们的政治权利而来。基于这种认识，在军事战场之外，一场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竞争——赢得民心对执政的认同——在边区广泛展开。应当说，群众路线是这一政治竞争的产物。

在群众工作的组织架构方面，需留意工作组的角色：桥梁角色——在中央决策和基层群众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；信使角色——将群众的需要和要求信息，传输到决策团体；总结经验和政策建议角色——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出改变政策的建议。在边区，群众工作的大量经验由工作队总结上达，他们与大区局的领导工作联系非常密切，使上级可能及时作出反应甚至战略转变，随时调整不为群众接受的工作目标。显然，上述做法的政治性后果是，有效寻得了革命领导团体和农民

³¹ 黎玉，减租增资的策略问题，《山东群众工作经验》，1943，页39，40。

³² 黎玉，减租增资的策略问题，《山东群众工作经验》，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，1943，页21-22。

利益的重合点，解决了农民对新政权执政的认同问题，从而促使他们变成共产党的支持者和革命者。

讨论

“群众路线”是对战争环境中政治竞争现实的反应，这一起因使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——了解和满足多数群众的需要和利益，以取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。群众路线旨在解决的核心问题，是争取群众对新政权的认同，最大程度地降低党和群众发生隔阂的“危险”。可以说，面对特殊环境下的政治竞争现实，群众路线作为回应战略，来自于党的政治生命之危机感，或可称为（中国式的）“执政合法性”之考量。

这决定了群众路线的本质原则：寻求党群在目标和利益方面的一致性，弥合并调整不一致性。在边区土改中，当群众工作符合这一原则时，发动群众就相当成功，偏离这一原则时，就困难重重。这些“利益”，具有经济（果实再分配）、政治（选择和监督权设置）、以及社会（地位结构变化）内容。经由边区整党，共产党不断约束自己的基层组织行为，并随时根据群众的反应调整偏差，直至被群众认同。经由“群众路线”，共产党在边区土改中完成了对政权支持基础的建造：人群辨识、利益分配、权利释放、开放领导位置吸纳群众代表（积极分子）。这些做法在党的局部执政区，以区别于旧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实验，展开与国民党政府的人心竞争。它是一场枪炮之外的政治战争，原因在于，在枪杆子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，只有满足群众需求和利益，才能解决对执政者的政治认同问题。共产党在这一竞争中的成效，为其巩固地盘、扩大战果、赢得人力物力资源、并快速取得全局性的胜利，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。

与此相应地，用阶级出身在群众中辨别“敌友”，辨别“坚定的”支持者或“动摇派”，……都大规模地开始于解放区的群众运动，这开启了在革命队伍中纯化阶级身份的进程。而在此之前，阶级的区分并没有那么凸显，早期被接纳到共产党队伍中的人员背景，单一“穷出身”者并不显突出。例如，1938年统计在册的延安抗大约4000名学员中，他们的“家庭成分”分布耐人寻味：其中贫雇农占36.5%；富农、官宦、资本家及地主占22.2%；中农及城市工人占37.3

%；城市手工业者或其他占 14%。³³ 众所周知，这些学员被认为是日后党政军的骨干力量和后备干部。

问题在于，由于群众路线是竞争政治环境下的产物，针对的是具体、当前面临的危险。这一特质，使其明显带有“工具”烙印，用于处理紧迫的政治问题，需要时就用，不需要时就被搁置。它的使用重点在修补（已经发生的问题），而非预防（防止发生问题），并且停留在倡导认识的层次上，未被推动成长成为一种防备机制，更未被制度化地巩固为一种体制的能力。遂在环境发生变化，政治竞争减弱或危险消失的时候，群众路线就失去了持久被需要的生命力，难以持续地发挥其防止“致命事情”的政治功能。

³³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简况统计表（1938.7）。资料来源：延安抗大展览馆展品。

参考文献

《山东群众工作经验》(党的工作参考丛书第五辑), 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, 1943年5月;

《群运手册》, 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, 无出版年;

《群众路线研究》, 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印, 民国36年6月;

《土改与整党文献》, 中共冀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, 1947年;

《中央关于对开明绅士政策的指示》, 1948年3月2日;

《土地问题指南》, 西北局宣传部编印, 1948年10月24日;

《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(草案)》,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处印, 1948年2月15日;

《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》(上下册试用本), 延安: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, 2008;

黄宗智, 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——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, <http://www.wyxsx.com/Article/Class14/200409/546.html>;

马润凡, 1947-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, 《党史研究与教学》, 2005年2期;

张鸣, 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——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(1946—1949), 网易历史 <http://history.news.163.com/09/0629/07/5CV6PT0700013FLL.html>;

邓宏琴, 反省: 集体化时代塑造乡村干部群体的运作机制, 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国际会议论文, 2009;

梁怡, 李向前主编, 《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》, 北京: 中共党史出版社, 2006;

王友明, 《革命与乡村: 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》, 上海: 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6;

荣敬本等, 《论延安的民主模式——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》, 西安: 西北大学出版社, 2004;

Mark Selden, 《革命中的中国: 延安道路》, 魏晓明, 冯崇义译,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2;

E.裴宜理, 重访中国革命: 以情感的模式,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工作论文, 2011, 3: <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0e793ed102de2bd960588d1.html>;

许纪霖, 宋宏编, 《史华慈论中国》,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6。